

Betrayal in High Places

高层的背叛

美国出卖盟友秘闻

詹姆斯·麦凯 著
JAMES MACKAY
何林荣 译

二次大战中，许多盟国官兵被日军俘虏，受到日军的虐待甚至谋杀。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并未因此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支付赔偿。为什么对日本如此宽容？由曾在日本俘虏营受尽苦难并在战后参与调查战犯工作的詹姆斯·高英·戈德温提供的各种档案文件写成的本书，向世人透露了其中的奥秘。



中国城市出版社

高层的背叛

——
美国出卖盟友秘闻

Betrayal in High Places

詹姆斯·麦凯 著
JAMES MACKAY
何林荣 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图书版编目(CIP)数据

高层的背叛:美国出卖盟友秘闻/(新西兰)麦凯著;何林荣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10

ISBN 7-5074-1056-0

I. 高… II. ①麦… ②何 III. ①战争罪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 ②日美关系-1945~-史料 ③英国-对外关系-1945~-史料 IV. K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432 号

责任编辑	张惠平		
责任设计编辑	王质麒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35833 64281366	传真	64238264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县兴达印刷厂		
字数	206 千字	印张	10.75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我愿明确证实本书的可靠性及其真实背景。首先可以说它是通过缜密的调查,目击者的叙述和保存下来的文件,最后才把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整理成书稿的形式。

自1951年以来,我就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于列表统计战争的惨祸,专注于1941~1945年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我从商船界退休后,在整理我的全部笔记时,发现有充分的资料可以用来编写一部供出版的书稿。但在提交原稿前,我觉得最好能增加战后年代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用以说明历史的进展。

这是一项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令人气馁的工作。我的许多调查遭到官方的阻挠,他们本应对我有所帮助,但是没有。在一些地方,我的陈述和我本人都绝对地不受欢迎,这也许是因为我太接近事件真相的缘故。

我的调查最初是历史方面的,后来在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以前的军方人员所拼命捍卫的一切竟充满勾结和背叛时,就不可避免地变成政治方面的了。幸亏我有一个拥有权势但处事谨慎的同盟者,他就是1975~1984年间任新西兰总理的已故罗伯特·马尔登爵士阁下。他以一向坦诚的

态度,提供有关政治问题的意见,而他对于日本人的看法,对我尤其有益。罗伯特爵士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军人。

我终于完成了第一稿,并把它交给在新西兰的出版商。果不其然,它因种种理由遭到拒绝。我没有灰心,又把书稿交给在英国的出版商。在那里我如愿以偿,不但按期出版,而且一直畅销全球。

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贴切地表达了它的内容,《盟国与日本的密谋:卷一》,概括了日本的战时野蛮暴行,揭露了战后最初几年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勾结。我相信就是因为后一个理由,该书遭到上述出版界的拒绝。它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

后来相当令我吃惊的是,得到了一些新的资料,我只能说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些新资料证实了第一次出版的书中的全部主张和论据,毫无疑问地排除了某些人认为该书是出自推测和假设的说法。

我所说的新资料(原件)是1950年从东京明治大厦偷拿出来的。明治大厦是盟国最高司令部的一部分,几个盟国联络使团在那里负责调查日本的战争暴行。他们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盟军最高司令部所辖的法律部工作。

法律部下设一个调查机构,一个执行逮捕的机构,许多法律顾问和独立存在的管理机构,位于俯瞰日本皇宫的明

治大厦第七层和第八层。附近的佳木公园旅馆旧塔楼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分部,那里是阵容庞大的英国战争罪行调查联络使团。麦克阿瑟将军的总部设在第一大厦,相距只有短短两个街区。

在盟军最高司令部(麦克阿瑟将军)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大厦,都由隶属于美国占领军的戴着白色钢盔的宪兵日夜警卫。

在这个当口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种普遍存在的误解。1948年3月下旬,一封电报从英国在新加坡的总部发往它在东京的对口部门;电报通知的内容是,英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罪行调查及起诉工作应立即结束。继而命令在东京的调查团停止一切正在进行的起诉,释放被拘留在东京巢鸭监狱的全部日本嫌疑犯——约55人,并准备关闭在东京的英国使团。

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加坡命令的震惊,一份公文从明治大厦送到设在佳木公园旅馆的英国总部,对这个命令提出抗议。并引证了下述事实:一名目前在押的日本陆军二等兵完全供认了多次屠杀的指控,还强调说这种性质的自愿招供是罕见的。它说明为抓到这个嫌疑犯花费了多少个月的细致调查工作,要求授权对这个战争罪犯进行起诉,不可半途而废。

次日下午三四点钟从新加坡得到了答复。回答的指示简单明确,“在押人员必须立即释放,一切战争罪行审判应

予停止。”作为这个命令的结果，所有被英国人逮捕，关押在巢鸭监狱等待审判的日本战争罪犯包括这名陆军二等兵都被立即释放。

英国战争罪行调查联络使团于是停止了工作，并在两个月内结束了它的活动。与此同时盟国最高司令部发布正式公报，向全世界宣告，“对于大部分日本战争罪行的调查和起诉，现已胜利完成。”这是一个意义含糊而且完全不真实的声明，我对此有以下的不同的看法。

如果公众信以为真，认为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调查和起诉从1948年3月即已停止，那么此项调查和起诉又如何可能一直继续进行到1950年2月10日？

这便是我刚才提到的误解。这难道是故意颠倒历史？如果真的如此，又是出自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这本书中明确而且无可辩驳地证实并非“全部”调查和起诉都已停止。可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公报为什么要撒谎呢？

其实盟国联络使团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一直仍在明治大厦中运转，继续进行他们的追捕日本战争罪犯工作——有数千战犯要受到审讯。支持我的看法的还有这样一个前所未知的事实，即盟国调查官员一直在继续逮捕被发现的嫌疑犯加以审讯，认定有罪即行起诉。

我的看法所根据的是真实的和不容置疑的证据。有人或许要问是什么证据？这证据就是1950年从盟军最高司令部管辖范围中偷偷拿出来的文件和战争罪行案卷。所有

这些从明治大厦暗中转移出来的资料都是高度保密的,并且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图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这段时间就是1950年2月的最后几天,而不是1948年。

这些显然一直保存完好的文件,证实了即使在1949年仍在继续进行战争罪行调查,直到1950年才遵照查尔斯·安德鲁·威洛比将军的明确指示骤然停止。威洛比将军是盟国情报机关的首脑,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副手和美国军队的一员。

这些以文件形式记载下来的证据——特别是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释放的日本战争罪犯的名单——最是无法逃脱的罪证。更为恶劣的是还有这样一种无须争辩的事实,即数以百计的由于滔天罪行而被通缉在案的日本战争罪犯,由于麦克阿瑟的命令而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和逮捕。

出自安全的考虑这些原始案卷已被分别照相复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分送到不为人知的地方保存。原件经过律师和法官仔细审阅后,对其真实性在3份分开的宣誓书上签署和连署了证词。原始的战争罪行案卷和文件已为后人保存起来,秘藏在澳洲某地。

编写一本这种性质的书真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因为它所揭露的史实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不过作为对已故陆军上尉詹姆斯·高英·戈德温的怀念(他的深谋远虑使得本书的编写能够实现),从称颂戈德温兢兢业业所从事的一切开始将是适当的。他乃是一心一意地要使他从东京麦克阿瑟

将军管辖权限下转移出来的历史文件能在他的身后保存下来。

这里应该提到,詹姆斯·戈德温为了他的国家,作为日本人的战争俘虏受尽折磨,经历了地狱般的凶惨暴行。在他后来为他的战时日记所写的附言中,曾表达了他的愤慨和担心;当然还有对他作为盟国情报官——特别是在1949~1950年——遇到的悍然阻挠感到憎恶。

詹姆斯·戈德温断言,强权政治和为了身居高位的日本人的利益,阻止了对几个战争罪犯的调查。此外还接到来自第一大厦——麦克阿瑟将军的总部——的难以理解的命令,释放了一些极需缉拿归案的战争罪犯。这些战犯由于他们臭名昭著的战争罪行,肯定要被判处终身监禁或送上绞刑架。

1950年2月中旬突然命令停止一切战争罪行调查时,詹姆斯·戈德温有一种被出卖的感受。接着又命令永远销毁所有战争罪行案卷,全然不顾半数以上的已知战争暴行尚有待起诉,或它们的犯罪者由于警察和政府官员的纵容仍然逍遥法外。这时詹姆斯·戈德温以一种不同寻常的,但是可以理解的决心处置了他的案卷,不过不是放进提供给他的容器,而是在有机会时装入他的公事皮包秘密转移出来。

近半个世纪后,许多战时日本人的真实暴行再次被揭露,被公诸于全世界,人们可以不受阻碍地对其加以审视和

评论。阴谋家或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再也不能发布免除罪责的命令了。长期被暗中破坏的正义和遭到故意压制的真情,随着时间流逝和环境变迁,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这需感谢詹姆斯·高英·戈德温,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1946年5月2日新西兰警察署致陆军总部的信

致副官长 L.C. 斯图尔特准将：

为答复你的4月15日关于上述内容的备忘录(关于起诉远东战争罪行詹姆士·高英·戈德温上尉的备忘录),已从戈德温上尉处得到宣誓证词,兹随信附上一式二份,同时附去随同你的备忘录一并收到的他的笔记的副本一份。

戈德温上尉拒绝提供他被拘留在日本战俘营的情况,并指出几名军官,他认为他们曾作了记录,在他们的报告中已包括了他所能陈述的一切。他说他不仅已被英国和新西兰军事情报官口头审查过,而且也被美国军事情报官口头审查过。

戈德温上尉的证词主要是叙述被许多不知名的日本人虐待的一般经过,但也有对一个名为多木的日本海军译员和一个名为野马佐加的日本海军军士的明确指控。

戈德温即将随同一支“J”部队的分遣队再次离开新西兰自治领。

J. 卡明斯
警察署长

附件：

随同戈德温关于贝哈尔号轮船在印度洋被击沉和乘客及船员受到日本人残酷虐待的证词一起附上的宣誓证词。

[参阅案卷 47/16A]

1981 年 7 月 15 日新西兰总理致本书作者的信

亲爱的詹姆斯：

我相信你的经过自己长期调查研究后所提供的关于日本人的资料。

正如你所说的，大量事实在战后年代的初期被盟国隐瞒。你的长期坚持，为历史后代进行有条不紊的调查取证，功不可没，这份耐心调查研究的成果终得以出现。

我期望这本书完成后能先睹为快。

谨致问候

R.D. 马尔登

总 理

[收信人詹姆斯·麦凯评注]

罗伯特·马尔登爵士曾任新西兰总理 9 年。他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归国军人，不仅是位爱国同胞，而且是

位坦白真诚,直言无隐的杰出新西兰人。即便在他任职总理期间,也从来没有不回复我的信件,有时还和我谈话。正是这位尊敬的总理转达了当时的检察总长的意见,即旧金山和约的第 14 条是有缺陷的。其根据是它显然非法地否认人权和公民权利,以及公民控告一个侵略国家应对其所干坏事给予赔偿的不可剥夺的自由。罗伯特爵士说,国际法不能用来维护一项令人置疑的“条款”,这项条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歪曲正义的事业和篡改真正的法律基础。他告诫人们需要动用一切力量和组织来向第 14 条进行挑战。

1995年3月7日新西兰总理致本书作者的信

亲爱的麦凯先生：

感谢你1月30日和2月9日的来信，以及你送给我的，你给我的同事沃伦·科珀阁下去信的副本。

你要求我解释你在第2封信中强调提出的说法。我给你的答复仍然和我的前任总理们一样，即：新西兰受到旧金山和约条款的约束。这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当时它似乎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作为旧金山和约的签署国之一，新西兰政府事后对这个问题不宜重新提出争论。

然而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能够自由地调查研究和出版书籍（例如你写的这本书）的社会，可以强烈地公开表明对立的观点，而无须求助于暴力行为。据我看来，这种价值观便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基础。

您的忠诚的

J. B. 博尔格

总 理

[收信人詹姆斯·麦凯评注]

总理信里下面划线的词句,承认了旧金山和约第 14 条——这是我给他的去信中谈论的主题——是建立在谋求权宜之计的协议基础之上的。这位总理谨慎地避免断言第 14 条(就其本身而言)是可以得到认可的。而是采取一种更安全的做法,引用国际法作为条约的保护者。他机敏地回避了第 14 条中有争议的问题,只承认当时它似乎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作者评注]

最佳解决方案是个模糊的托词,并未含有必须遵守或严格应用法律规定的意思。

二次大战中，许多盟国官兵被日军俘虏，受到日军的虐待甚至谋杀。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并未因此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支付赔偿。为什么对日本如此宽容？由曾在日本俘虏营受尽苦难并在战后参与调查战犯工作的詹姆斯·高英·戈德温提供的各种档案文件写成的本书，向世人透露了其中的奥秘。